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毛澤東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毛澤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鄭州市行政區裕生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地方國營新鄉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 $\frac{11}{16}$ ，字數7,000

1951年10月第1版 1952年7月第2版

1958年10月鄭州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68 定價（5）0.06元

統一書號：1001·85

出版者說明

本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書，
是根據一九五二年七月出版的「毛澤東選
集」第一卷第二版中所載原文重印的。

在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上，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他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要到來，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他們不贊成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在福建、廣東、江西之間的三個邊界區域的流動游擊，同時也沒有在游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此也就沒有用這種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他們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羣衆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範圍的大革命。他們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

取羣衆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他們的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因之，也就會明白農村起義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規模的發展。三，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這個口號的正確。四，就會明白相應於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着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於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五，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

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會明白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二〕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綫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羣衆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爲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們不切當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三〕，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這種估量，多半是從主觀主義出發。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這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觀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這也是一種不切當的估量，又必然要產生另一方面的壞結

果。因此，在判斷中國政治形勢的時候，需要認識下面的這些要點：

(一) 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這樣就可以解釋現在西歐各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比現在中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也許要強些，但因為它們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比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更要強大許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時爆發革命。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因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對地弱的，所以中國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

(二)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

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裏用得着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裏不僅是具

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以後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嚮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

(三) 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這樣，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實質。當湘贛邊界割據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當時湖南省委的不正確的估量，把階級敵人看得一錢不值；到現在還傳為笑談的所謂「十分動搖」、「恐慌萬狀」兩句話，就是那時（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統治者魯滌平⁽⁵⁾的形容詞。在這種估量之下，就必然要產生政治上的盲動主義。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蔣桂戰爭⁽⁶⁾尚未爆發之前）約四個月期間內，敵人的第三次「會剿」⁽⁷⁾臨到了井岡山的時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提出來了。其實，那時英、美、日在中國的鬥爭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蔣桂馮混戰的形勢業已形成，

實質上是反革命潮流開始下落，革命潮流開始復興的時候。但是在那個時候，不但紅軍和地方黨內有一種悲觀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時也不免爲那種表面上的情況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觀的論調。中央二月來信，它就是代表那時候黨內悲觀分析的證據。

(四) 現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只觀察當前表面現象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化起來，彷彿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這種抓住表面拋棄實質的觀察，是因爲他們對於一般情況的實質並沒有科學地加以分析。如問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來，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決定。既然國際上帝國主義相互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帝國主義和它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

迫切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來。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着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着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資的壓迫，廣大農羣衆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

並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於一天，使得士兵羣衆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爲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於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爲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爲生產落後，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譁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上面的話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就已經有了。

那封信上說：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九日）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

國民黨三次「進剿」井岡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後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革命潮流逐漸升漲。黨的戰鬥力組織力雖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的形勢之下，恢復一定很快，黨內幹分子的消極態度也會迅速消滅。羣衆是一定歸向我們的。屠殺主義（^①）固然是爲淵驅魚，改良主義也再不能號召羣衆了。羣衆對國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滅。在將來的形勢之下，什麼黨派都是不能和共產黨爭羣衆的。黨的六大大會（^②）所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按：應加「在大城市中」五個字）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羣衆而不是馬上舉行暴動。但是革命的發展將是很快的，武裝暴動的宣傳和準備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在大混亂的現局之下，只有積極的口號積極的態度才能領導羣衆。黨的戰鬥力的恢復也一定要在這種積極態度之下才有可能。……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勝利的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的創造，是目標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但是在同時，農村鬥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

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鬥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市鬥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爲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爲也是錯誤的。因爲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

這封信對紅軍的行動策略問題有如下的答覆：

「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於保存紅軍和發動羣衆。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以連或營爲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游擊的戰術發動羣衆，避免目標，我們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計劃過，而且多次實行過，但是都失敗了。因爲：（一）主力紅軍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衛隊來歷不同。（二）分小則領導不健全，惡劣環境應付不來，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四）愈是惡劣環境，隊伍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決奮鬥，方能團結內部，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裏才好分兵游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的刻不能離。」

這一段話的缺點是：所舉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極的，這是很不夠的。兵力集中的積極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滅大一點的敵人，才能佔領城鎮。消滅了大一點的敵人，佔領了城鎮，才能發動大範圍的羣衆，建立幾個縣聯在一塊的政權。這樣才能聳動遠近的視聽（所謂擴大政治影響），才能於促進革命高潮發生實際的效力。例如我們前年幹的湘贛邊界政權，去年幹的閩西政權（也），都是這種兵力集中政策的結果。這是一般的原則。至於說到也有分兵的時候沒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游擊戰術，那裏面包括了近距離的分兵：

「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羣衆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羣衆，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

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羣衆。」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羣衆，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這裏所謂「打開」，就是指近距離的分兵。例如湘贛邊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時，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在永新境內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時，二十八團往安福邊境，二十九團往蓮花，三十一團往吉安邊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贛南各縣的分兵，七月在閩西各縣的分兵。至於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環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因爲分兵的目的，是爲了更能爭取羣衆，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若不能達到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敗，削弱了紅軍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贛邊界分兵打郴州那樣，則不如不分爲好。如果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那就無疑地應該分兵，因爲在這兩個條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這封信給了四軍黨內一部分同志以不